

間窻莫辨南還
 唐火氣都無有
 葆光便是訛傳
 獨食器斝杯却
 識麥思傾龍
 腦香薰蜀錦
 夢清無事詞康
 居配碁解釋三
 鄭急護識黃虬
 正不如
 乾隆御題



北宋 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皇帝的汝窯鑑賞觀及識別歷程

余佩瑾



南宋人視野下獨佔鰲頭的北宋汝窯，由於傳世稀少，備受歷來鑑賞家青睞。時至今日，其獨特的釉色與燒造工藝仍然超越群倫，堪稱永恆的經典。回溯汝窯研究史，一九三〇年代，大衛德爵士因承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而有機緣論汝窯，文中除了考證文獻記載中的汝窯釉色和燒造背景之外，也引用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來印證所說。當時空進入二十一世紀，謝明良教授綜述北宋官窯的研究，同樣回顧了一部分乾隆皇帝的鑑賞觀。兩位前輩穿越時空對話，雖然高度無法企及，但確實從中獲得許多啓發。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從乾隆皇帝收藏過的汝窯探討他的鑑賞觀，並淺析一段鮮為人知的識別歷程，以作為觀摩學習的紀錄。

乾隆皇帝收藏的汝窯

如果從收藏印記著手，那麼器底鐫刻有御製詩，以及乾隆皇帝降旨組合陶瓷多寶格之際收入典藏圖錄中的汝窯，因刻詩或圖錄製作的背後均有皇帝親自降旨交辦的流程，而間接提

供了確實有據的線索，讓後人得以從中重建一個流傳有緒的脈絡，故毫無疑問可以將這些作品看成是乾隆皇帝經手鑑識的收藏。那麼據此原則對比實物，截至目前為止所發現鐫刻有御製詩的二十一件汝窯，和收進圖錄中

的四件汝窯，則能作為探討、觀察乾隆皇帝識別汝窯的基礎素材。

多寶格圖錄中的汝窯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共收藏有四本陶瓷圖冊，根據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記事（以下簡稱《活計檔》）所錄，這四本陶瓷圖冊最初正像目前仍然維持著原狀收藏狀態的「範金作則」一樣，是四組瓷器多寶格中的圖錄。

其中《埏埴流光》多寶格組合於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之間（一七五五—一七五六），畫中的「宋汝窯磬口洗」，經與傳世實物比對，極可能是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汝窯。而「宋



圖一 清 乾隆 《燔功彰色》冊 宋汝窯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一寸深八分口徑四寸一分粉青色水紋圈足底有三釘中破作尸識筆銜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按汝與官相似而汝瓷質釉稍厚此器校之於諸無不膾合



圖二 清 乾隆 《燔功彰色》冊 宋汝窯舟形筆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一寸深八分口徑三寸二分橫四寸六分粉青色水紋中有如意暗花二爪微拗有三釘按汝瓷以卵白為上粉青為次官窯則以粉青為上淡白為次官窯紫口鐵足此器口足皆白而色微青是汝之次稍優於官之上也

葉賞《坦齋筆衡》和明人高濂《遵生八牋》兩本書來識別汝窯瓷器。即使在個別作品的說明中另外加上個人的品評，如《燔功彰色》冊中強調「汝窯質釉稍厚」，或是「此器口足皆白

而色微青，是汝之次，而優於官之上也」地陳述個人的鑑賞觀，但若對照《遵生八牋》，而不難理解乾隆皇帝的觀點乃出自該書中有所謂「汝窯，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

汝窯舟形筆洗」因帶有印花紋飾，故可能是臺北故宮或大英博物館所藏心底帶有印紋的同類作品。

《燔功彰色》多寶格組合於乾隆二十一至二十二年之間（一七五六—一七五七），畫中的「宋汝窯磬」（圖一）圈足出現一道橫線縮釉痕，且底部帶有「乙」字銘，反映出正像北京故宮的藏品。至於「宋汝窯舟形筆洗」（圖二），因口沿存在一點金彩修補痕，而明顯地能和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做一對照，傳達出以該件作品入畫的可能性。

《珍陶萃美》多寶格組合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左右，畫中的「宋汝窯蟠龍洗」於一九六〇年代出版的《故宮瓷器錄》中已被修正為「南宋修內司官窯粉青雕龍圓洗」，後來謝明良教授撰文再度確認是「南宋官窯青瓷龍紋洗」，並且據以指出該件作品正是乾隆皇帝把南宋官窯當作汝窯的例子。

這幾本多寶格圖錄透露出乾隆二十一年左右，乾隆皇帝主要依賴宋人

和「以官窯較之，質製滋潤」，「所謂官者，燒於宋修內司中，為官家造也。窯在杭之鳳凰山下，：」的進一步演繹。

鐫刻御製詩的汝窯

就傳世刻有御製詩的汝窯瓷器而言，如果交叉比對乾隆皇帝歌詠汝窯的御製詩，和刻有御製詩的汝窯，可以發現其中存在一個複雜的識別歷程與鑑賞問題。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實際歌詠汝窯的御製詩傳世只見七首，其中四首鐫刻到七件汝窯瓷器的底部。而剩餘的三首中，《題汝窯奉華盤》目前尚未發現鐫刻的例證，餘兩首《詠汝窯瓷枕》和《題汝窯雙耳瓶》，則分別鐫刻到鈞窯和當朝瓷器上。那麼二十一件刻有御製詩的汝窯中，七件刻有詠汝窯詩的作品，無疑可視為是乾隆皇帝識別出來的汝窯。其餘十四件同樣刻有御製詩的汝窯，依照御題詩名和詩文內容，則可追溯到它們其實是被當成「修內司窯」、「北宋官窯」和「章生二窯」來歌



圖四 北宋 汝窯青瓷奉華紙槌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北宋 汝窯奉華銘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北宋 汝窯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頌。

如果觀察刻有汝窯詩的汝窯，依照署款時間先後，可得知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降旨鑄刻臺北故宮收藏的青瓷盤（圖三），在《詠汝窯盤子》詩中追述了宋人周輝《清波雜志》（一一九二）中對於「汝窯宮

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為油，惟供御揀退，方許出賣」的記載。由於這首詩在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又被鑄刻到其他三件汝窯瓷器的底部。而讓筆者以為當可將此詩看成是乾隆皇帝對汝窯的基本認識。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降旨

鑄刻北京故宮收藏的青瓷碗，在《詠汝窯碗》詩中感歎汝窯窯場不再，緬懷之餘，也警惕自己務必記取宋徽宗玩物喪國的教訓。但是誠如謝明良教授指出般，令人深感不解的是乾隆皇帝彷彿完全忘記了他曾經歌詠過的汝窯碗，於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時，竟然降旨將一首《題鈞窯碗》詩刻到造型與之相似，目前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的汝窯碗，表現出一種鈞汝不分的鑑賞觀。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降旨鑄刻臺北故宮收藏的青瓷紙槌瓶（圖四），在《詠汝窯瓶》詩中轉述了宋人葉寘《坦齋筆衡》中「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鄆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的記載，同時在詩注中也透露其實是根据《輟耕錄》中輯錄的《坦齋筆衡》來掌握汝窯的資訊。對於作品底部另外存在的「奉華」兩字銘，也指出：「內府有汝窯盤，底鑄奉華二字。考奉華乃宋高宗劉貴妃之號，妃善畫，每用奉華印，此瓶釉色製法與

盤無異，亦刻奉華二字」。表達出他其實是透過清宮舊藏「奉華」銘盤的釉色特徵（圖五），判斷這件作品的窯口。同時對於「奉華」兩字銘也進行一番考證，進一步說明該品和南宋劉貴妃的關係。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降旨鑄刻現藏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青瓷盤，在《題汝窯盤子》詩中，一方面感歎像汝窯這樣的優質瓷器，傳世罕見。

另一方面也將汝窯和修內司窯連在一起。流露出他眼界下的修內司窯，其實可上溯至北宋。

如同前文所言，乾隆皇帝降旨御題，從中只揀選出四首詠汝窯詩，那麼剩下的三首詩刻到什麼作品上呢？

事實上，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方被輯錄進御製詩集中的第一首《詠汝窯瓷枕》，其實是刻到臺北故宮收藏的鈞窯瓷枕底部。



圖九 北宋「丙」字銘青瓷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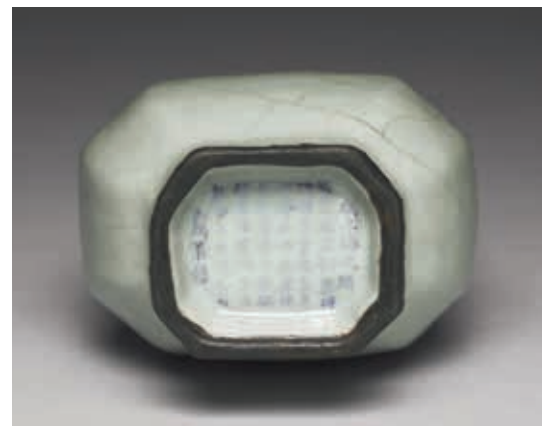
圖十 北宋 汝窯「丙」字銘青瓷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透露出乾隆皇帝不僅將鈞窯瓷枕看成是北宋製品，同時也以「色潤瑪瑙油」呼應《清波雜誌》中的記載，再度表現出鈞汝不分的鑑賞觀。

第二首〈題汝窯奉華盤〉，對照傳世品，明顯可知正是歌詠臺北故宮收藏的奉華銘碟。（圖五）詩中透過清人吳焯（一六七六—一七三三）所著《南宋雜事詩》，追溯出「奉華」兩字銘代表劉貴妃，那麼鐫刻有奉華銘的汝窯碟，正是經過劉貴妃珍藏的標記。



圖七 清 仿汝釉月白八方貫耳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元 鈞窯天藍紫斑如意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三首〈題汝窯雙耳瓶〉，在乾隆皇帝的諭旨下，鐫刻至清仿汝釉貫耳瓶的底部。（圖七）由於該件作品已經經由謝明良教授指證出是一件形、釉都和大英博物館收藏帶「大清乾隆年製」款的當朝官窯相似，故可將該品作為乾隆皇帝降旨御題當朝官窯的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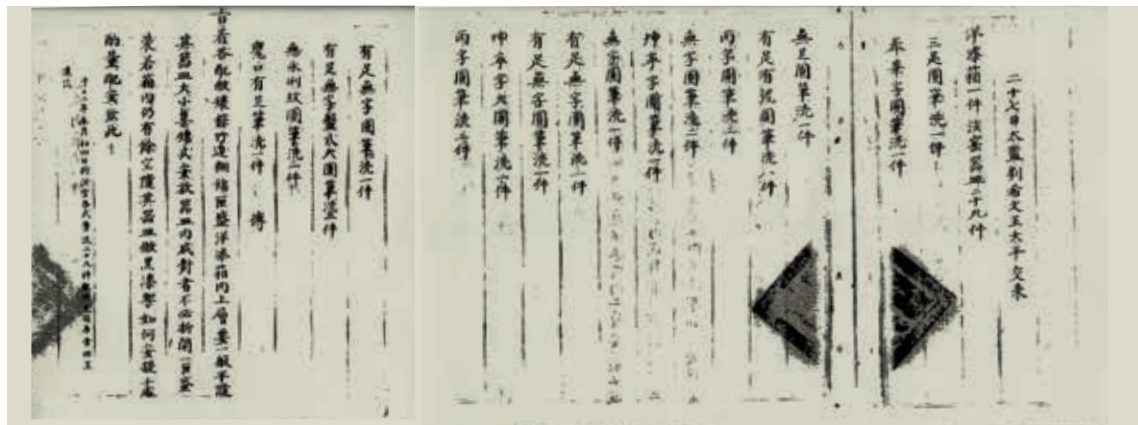
至於其他十四件鐫刻有御製詩的汝窯，詩中的鑑賞觀為何？同樣依照御題時間先後，而可得知，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降旨將〈獨食盆〉鐫刻到無紋水仙盆底部。就目前的御題款識看來，這件作品應該是最早獲得御題的汝窯瓷器。（圖八）乾隆皇帝在御製詩的詩注中以「實宋修內司窯器也」，表示他將汝窯水仙盆看成是修內司窯器的產品。同一首詩也被刻到另外兩件水仙盆的底部，但無標示鐫刻時間。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乾隆皇帝降旨將〈題官窯碟子〉分別鐫刻在收藏於臺北和北京兩個故宮的三件青瓷盤底部。（圖九、十、十一）詩中以「秘器猶存修內遺」將該器視



圖八 北宋 汝窯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清 雍正7年(1729) 匣作：四月二十七日條「洋漆箱」



圖十一 北宋 汝窯「丙」字銘青瓷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達他將汝窯看成是北宋官窯的想法。前述無論是「修內司窯」和「章生二窯」，藉由御製詩文的傳達，而得知在乾隆皇帝視野下，一律將之視為是北宋的官窯。

識別歷程

透過乾隆皇帝經手收藏的汝窯，可以歸納出他以汝窯為汝窯，以汝窯為北宋官窯，以汝窯為修內司窯，以汝窯為鈞窯，以汝窯為章生二窯，和以鈞窯為汝窯，以南宋官窯為汝窯，以及也以當朝官窯為汝窯等複雜多變，又糾結不清的觀點。雖然如此，我們也無法忽略乾隆皇帝鑑賞、識別和御題汝窯的時間多半發生於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以後，整個背景牽涉到他著手整理、重建清宮典藏的實際作為。但由於本文旨在探討乾隆皇帝識別汝窯的歷程，故以下只針對以汝窯為汝窯的觀點進行說明。

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在《活計檔》記事登錄了一箱流傳於雍乾兩朝的汝窯瓷器。雖然目前尚無法追

為是修內司窯。又因這三件作品的外底心均存在一個「丙」字，故引發他視之為等第記號的聯想。也因此，讓他在詩中表達出凡被古人看成是為丙等的瓷器，絕對有提升至甲等的身價。相同的作法，亦可上溯至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降旨鐫刻〈詠官窯盤子〉視「甲」字為甲等標記，並且下達「內府古器列上等等者，匣座皆刻甲字」的裁示。甚至進一步延伸至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降旨鐫刻〈戲題官窯盤子〉，面對外底已然存在的「甲」字，仍舊陳述以古「丙」為今「甲」的想法。

乾隆四十年（一七四五）乾隆皇帝降旨將〈詠官窯溫壺〉鐫刻在臺北故宮收藏的青瓷膽瓶底部。詩中以「生二精陶實出群」，說明他將該件作品看成是章生二窯。那麼進一步追溯御製詩文的內涵，也發現乾隆皇帝筆下的章生二窯和哥窯，存在著或龍泉或杭州，一種游移兩處、舉棋不定的觀點。反映出他和現代學者一樣，即使如實參考文獻記載依然存在無

溯出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匣作：四月二十七日條）下所出現的汝窯箱從何而出，然而箱內收存的青瓷在當時已標示出汝窯是不爭的事實。（圖十二）而且裝箱清單中存在一筆「奉華字圓筆洗一件」，和兩筆「丙字圓筆洗二件」，因充分能和傳世品對照，故說明乾隆皇帝鑑賞之前，其實早有宮廷文物專家辨識出汝窯，而此份鑑識觀點日後也影響他判斷的考量。依照雍正朝《活計檔》的記事，這箱汝窯被提出後，雍正皇帝降旨為每件汝窯瓷器配製新的錦匣，整個工作一直進行到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才告完成。如果將這段記事對照乾隆十六年《活計檔》記事中所出現一箱名為「品重青瑤」的汝窯（匣作：十一月初三日條），當能從中溯及流通的經過。

根據乾隆朝記事所示，乾隆皇帝降旨為已見蟲蛀的內匣更換木胎，該木箱的外箱為洋漆箱，內裝二十三匣共計二十八件汝窯碟。此一材料對比雍正七年裝有二十九件汝窯的洋漆

法進一步解決問題的困擾。同一年乾隆皇帝降旨御題臺北故宮收藏的青瓷盤，透過〈詠官窯盤〉說明他將該件作品看成是修內司窯。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四六），降旨御題臺北故宮收藏的青瓷紙槌瓶，在〈題官窯瓶〉詩中將該件作品看成是章生二窯。這個情形如同前述汝窯碗，分明面對同一形制的瓶子，但卻將一件看成是汝窯，另一件為章生二窯。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降旨御題臺北故宮收藏的另一件青瓷盤，在〈詠官窯盤子〉詩中，盛讚該件瓷器足以作為宋瓷代表。同一年，又在北京故宮所藏青瓷三足洗底部御題〈詠官窯三足洗〉，視該件作品為北宋瓷器。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降旨御題臺北故宮收藏的青瓷盤，在〈詠官窯盤子〉的詩注中追溯了宋人陸游《老學庵筆記》及明人田藝衡《留青日札》中的相關記載。由於該兩部書主要論述與汝窯相關的種種記事，故讓筆者以為乾隆皇帝引述發表，正表



圖十五 北宋 汝窯「丙」字銘青瓷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青瓷碗，透過該畫所示口沿鑲嵌銅釘的特徵，而可瞭解畫中所見瓷器正是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汝窯青瓷碗。通過該碗內底存在的御製詩，同樣可追出一件汝窯青瓷碗從雍正朝傳留至乾隆朝的情形。（圖十四）

同樣的，傳世四件「丙」字銘汝窯青瓷碟（其中一件收藏於臺北故宮，另外三件收藏於北京故宮），則明顯地能對照雍正朝汝窯箱中存在的兩筆「丙字圓筆洗兩件」（圖十五），從其中三件器底均鐫刻同一首御製詩，而能印證乾隆朝汝窯收藏傳承自雍正朝的史實。加上前述深刻開啓乾隆皇帝視野的「奉華」銘圓筆洗，也屬於雍正朝汝窯箱中的一件作品，再再反映出乾隆皇帝對汝窯的識別，確實有一部分承襲自雍正朝。

那麼雍正朝對汝窯的認識來自於何處？依常理判斷，承接自康熙朝的收藏與識別成果是其中一個可能性，雖然雍正皇帝檢視康熙朝留下來的百事件不見得和識別出汝窯有關（匣作：正月二十七日條），但是重整的

處理方式即透露出對前朝收藏積極加以理解的態度。由於筆者目前所能掌握的康熙朝資料十分有限，因此以下僅就雍乾兩朝狀況進行梳理。如果從仿燒的背後勢必要理解臨仿的對象，那麼除了前述汝窯箱之外，《陶成紀事碑記》（一七三五）的仿燒品目或是另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對實際駐廠監造燒瓷的唐英而言，當他總結雍正官窯燒過的各種釉彩時，曾記錄一類「仿銅骨無紋汝釉，仿宋器貓食盆、人面洗色澤」的作品。而此「貓食盆」、「人面洗」同時歸併於仿汝釉之下，必然和汝窯有某種關聯。

事實上，「貓食盆」和汝窯的關係，可以透過乾隆皇帝御製詩和《活計檔》記事來理解。亦即在傳世品中，共有五件水仙盆刻有乾隆皇帝御製詩，其中三件是北宋汝窯，兩件是清仿品。而三件汝窯水仙盆的底部都刻著同一首「獮食盆」詩，兩件清仿品則分別刻出「題官窯盆」和「詠官窯盆」兩首詩。由此可知，乾



箱，除了外箱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外，因雍正十年雍正皇帝會從洋漆汝窯箱中提取一件〈三足汝窯洗〉留在身旁使用（匣作：三月二十五日條），而



圖十四 清 雍正 古玩圖 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The British Museum)

可依此推斷乾隆朝所見裝有二十八件汝窯的洋漆箱，應該正是雍正朝留下來的作品。這種文物流傳的現象，亦可透過畫中瓷器見證整個經過。

如表現雍正皇帝未登基前收藏狀況的〈十二美人圖〉之〈鑑古〉軸，畫中的汝窯水仙盆和三足洗不僅同時和臺北及北京故宮的藏品相似，而且從該兩件作品器底均刻有乾隆皇帝御製詩，而可追溯到兩件汝窯從康熙朝流傳到乾隆朝的經過。（圖十三）同樣的情形亦見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古玩圖〉卷中的汝窯



圖十三 清 十二美人圖 鑑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清 《御筆書畫合輯》冊頁 汝窯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隆皇帝降旨御題時是將水仙盆看成是「獨食盆」或「官窯盆」。特別因「獨」字在康熙字典中為犬名，係指小狗的一種，而說明清宮將水仙盆的器形看成是寵物的餵食盆。據此回溯活計檔記事，則可發現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一件「汝窯貓食盆」經過呈覽之後，得到奉旨加鑲銅釘的處理。由於記錄顯示這件作品帶有木座，木座內並且儲藏一本冊頁（金玉作：正月初八日條），這樣的注記不由得令人聯想到《故宮瓷器錄》中所登錄一件帶木座，木座並且安裝可以開啓的抽屜，口沿也加嵌銅釘的汝窯水仙盆（圖十六），而反映出水仙盆的器形於雍乾兩朝確有「貓食盆」之稱。不過因傳世共見兩件口嵌銅釘的汝窯水仙盆，故檔案所指或不一定是指臺北故宮的藏品，也有可能是指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收藏。

除此之外，貓食盆的記事亦可上溯至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當時太監胡世傑交出一件「汝釉貓食盆」，這件作品隨附一個「象牙齒紅座」，座內「安磁青紙摺子，簽子寫博古格，小字寫雍正已酉集成」，流露出該件「汝釉貓食盆」原本收藏於雍正朝聚組完成的博古格中（廣木作：九月初四日條）。至乾隆十年（一七四五），這件作品被翻製成木樣，通過乾隆皇帝降旨交給景德鎮御窯廠的督陶官唐英仿燒（江西：五月初一日條）。而且除了博古格之外，《活計檔》記事也記錄了當時的多寶格中還儲藏著另外一件貓食盆（法瑯作：十一月十四日條）。

博古格和多寶格中的貓食盆到了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又被登錄成「官窯腰圓洗」（皮裁作：十月初八日條）。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皇帝降旨御題一件「官窯腰圓洗」（如意館：三月二十五日條），由於該件作品的木座加裝有〈御臨王羲之帖〉，明顯地能和臺北故宮收藏清仿汝釉青瓷水仙盆的傳世原狀相對照，從該件作品至今仍然隨附著木座及冊頁，而且底部題識紀年亦為乾隆四十三年，而可推知除了



圖十六 北宋 汝窯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貓食盆」之外，水仙盆器於乾隆朝亦有「腰圓洗」之稱。同樣據此回溯雍正朝的檔案記事，那麼雍正元年獲得加裝金口的「汝窯腰圓筆洗」或是指另外一件水仙盆。另一方面，隨著文物頻繁的移動，通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匣裱作：十二月初六日條）、四十二年（廣木作：十二月二十三、日條）的兩則記事，也可獲知這類「貓食盆」的木座，通常配裝有

皇帝御筆書畫冊頁，從中表露出乾隆皇帝對汝窯水仙盆的認識即使傳承自雍正朝，但藉由木座抽屜所加置的御筆冊頁，重新賦予一件作品一個全新的陳設典藏面貌。（圖十七）至於御製詩名將「貓食盆」稱為「獮食盆」，或是將犬名視為貓科之故。那麼同樣出現在《陶成紀事碑記》中的人面洗為何？由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的《活計檔》記事曾出



圖十八 清 仿官釉青瓷耳杯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Guimet Museum）

現怡親王允祥為兩件古磁人面洗配作合牌錦匣（匣作：三月初四日條），可間接可推知唐英仿燒應與之相關。然而人面洗究指何物？其器形依照《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登錄的「哥窯人面洗」來判斷，應該指耳杯一類作品。加上明人陳繼儒《妮古錄》中也出現「官窯人面杯」，而可進一步類推人面洗或是明清以來對瓷耳杯的一種說法。尤其是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仿官釉青瓷耳杯底部刻有《詠官窯瓶》御製詩（圖十八），間接說明該類作品和清官窯仿燒南宋官窯的關係。雖然我們無法直接將吉美博物館的藏品和唐英仿燒作一連結，而視為是雍正官窯的成品，同時該件作品分明是一件耳杯，但器底卻鐫刻歌詠瓷瓶詩，明顯不對題。然而若考慮到臺北故宮收藏的南宋官窯青瓷葵花碗底部也被鐫刻上《詠官窯葵花盤》詩，同樣流露出文物的實際器型無法和御題詩名互為呼應的狀況，而無法排除御題屬實的可能性。兼且該首《詠官窯瓶》詩中乾隆皇帝猶然而生「復古誠知不易云」的感嘆，讓筆者

以為恰能呼應《詠汝窯盤子》時所出現「而今景德無斯法」的感想，故仍將之看成是流通於雍乾兩朝的仿官實例。以此對照《陶成紀事碑記》的記載，說明雍正官窯仿燒官、汝釉色，存在一種無法完全區隔的樣貌。

最終最令人深感好奇的是，雍正皇帝的身旁究竟誰有眼力識別出汝窯瓷器呢？其實翻閱雍正朝活計檔記事，不難發現雍正皇帝身旁不乏利眼之士，例如得力助手怡親王具有辨識「蓮花瓣佛尊」及各式木碗的能力，而西洋傳教士郎世寧曾經代為認看

朝造辦處中新出現專門鑑識各個窯口出產品的楊起雲，在探討乾隆皇帝識別歷程中，或也可將之列入，看成是持續辨識汝窯的後起之秀。總之，觀察乾隆皇帝以汝窯為汝窯鑑賞觀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他識別歷程中所接收到的一箱傳承自雍正朝的汝窯，以及綜合歷朝宮廷文物專家的鑑識經驗，和參酌文獻記載後自行體會等三個不同層次。那麼以古鑑

今，他時而清晰，時而模稜兩可的鑑賞觀，即使碰觸到今日新加入的考古材料，仍然有其加以省思借鑑之處。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西洋字」，玉匠陳挺秀認得各式珍玩，譚宗德能夠辨識識金器；其中又因為袁景勛曾於雍正二年、三年、四年連續認看瓷器，以及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也降旨「燒瓷器人」認看做樣瓷器（記事錄：四月十一日條），而反映出如同袁景勛般的宮廷文物專家，以及監督燒瓷的年希堯和唐英都可能是識別出汝窯瓷器的人員。特別是唐英於乾隆朝仍然出任御窯廠督陶官，以及也仿燒「汝釉貓食盆」，除了接續了雍正朝以來的發展脈絡之外，乾隆

參考書目

1. David, Sir Percival.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Transactional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Vol.14 (1936-37), pp.18-69.
2.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臺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一九六一。
3. (清)高宗撰，《清高宗御製詩文集》（景印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六。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一一五五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
5. 謝明良，〈乾隆的陶器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二二卷二期（二〇〇三），頁一一三。
6.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
7. 余佩瑾等，《大觀：北宋汝窯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六。
8. 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故宮學術季刊》二七卷四期（二〇一〇夏），頁一一四。
9. 余佩瑾，〈從御製詩看乾隆皇帝典藏的汝窯〉，《故宮學術季刊》二八卷三期（二〇一〇春），頁六一—一〇八。
10. 余佩瑾，〈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器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〇。
11. Crick, Monique et al. *Chines Impériale : Splendeurs de la Dynastie Qing 1644-1911*, Genève: Fondation Baur, Musée des Arts d'Extrême-Orient, 2014.